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关于古代礼制、礼学的经典有《仪礼》、《周礼》、《礼记》三部，习称“三礼”。《仪礼》原称《礼》，汉初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仪礼》在“三礼”中最早立于学官，是礼的本经，所以又称为《礼经》。《仪礼》共十七篇，记载古代冠礼、婚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丧礼、祭礼等礼仪，是古礼的调数，学术价值很高。汉魏之际，一直是显学，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仪礼》记载的制度逐渐远离现实生活，加之古文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叹其难读，人们对它热情不再，诵习者寥若晨星。古代科举分房阅卷，北宋熙宁中，王安石改革科举，索性取消《仪礼》之房，不再立于学官。直到清代，科举考试再也不考《仪礼》，诵习《仪礼》的人也就更加稀见，其学不绝如缕。书商刊印更是漫不经心，刻本的讹误也就日甚一日，鲁鱼亥豕，满目榛荆，难以卒读。但就是这样一部书，经出清人之手后，居然焕然一新，在群经研究中来居上，成为清代学术研究中的一大亮点。

彭林 主编

# 清代学术讲论





QINGDAI XUESHU JIANGLUN

# 清代学术讲论

彭林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学术讲论 / 彭林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33-5734-3

I. 清… II. 彭…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45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335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册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黄爱平 《四库全书》七讲/1
- 彭 林 清人的《仪礼》研究/21
- 蔡长林 常州学派略论/45
- 王俊义 钱谦益的政治人生与明末清初  
学术之演变/61
- 章启辉 王夫之对宋明理学的批评/86
- 郑吉雄 戴东原的经学与思想/118
- 蒋秋华 阎若璩与汪琬/143
- 赖贵三 “五经皆学,三礼成图”——乾嘉  
通儒扬州焦循里堂学记/163
- 张丽珠 清代经学名臣一重镇:阮元/189
- 朱瑞平 孙诒让校勘学管窥/212
- 吴仰湘 皮锡瑞的生平和学术/246
- 方光华 刘师培与晚清经学研究/268
- 程 钢 《几何原本》对儒家思想学术的影响:  
以徐光启与焦循为例/300



## 《四库全书》七讲

□ 黄爱平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图书典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要传承下来,要发展下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图书典籍。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如此。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从古至今惟一的传承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有着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我们今天讲的《四库全书》,就是中国古代典籍宝库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 一、《四库全书》的性质和特点

《四库全书》是一部书,但它并不是任何个人的专著,而是汇聚了数千种书籍的一部大书。这种总汇群书的书,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丛书。这个“丛”,是聚集、众多的意思。我们说草木丛生、灌木丛,说的就是草木聚集的样子。草木聚集在一起叫丛集,杂说、杂谈汇集在一起叫作丛谈,而书籍汇编在一起,就叫作丛书。因此,就《四库全书》的性质而言,它是一部丛书。

那么,丛书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追本溯源,“丛书”这个名称最早

出现在唐代,当时有一个叫陆龟蒙的学者,把自己的文集定名为《笠泽丛书》。但他这里的“丛”,用的是这个字的另外一层含义,即繁杂细碎。陆龟蒙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著述比较琐碎,不登大雅之堂。所以说其书有丛书之名,无从书之实。真正的丛书出现在宋代,即南宋时期。当时有两位学者,一位叫俞鼎孙,一位叫俞经,他们把6种宋人的著作汇编在一起,题名为《儒学警悟》。这部书被认为是正式丛书的开创之作。但是这部书只是以抄本流传,并没有刊刻,我们现在看到的刻本是后人刊刻的。在此之后不久,也是南宋时期,有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叫左圭,他把唐宋时期的100种著作汇编在一起,题为《百川学海》,并且雕版印刷,成为第一部刊刻发行的丛书。自此以后,丛书的编纂就开始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甚至成为学术界的一时风尚。《四库全书》就是在清代乾隆时期编纂成书的。

《四库全书》还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丛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卷帙浩大,一是收罗齐备。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我们先来看它的卷帙浩大。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编有大部头的书籍,如宋代有著名的三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和《文苑英华》。它们的篇幅都是1000卷。这个1000卷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以《太平御览》为例来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太平御览》刚编成的时候,并不叫《太平御览》,而是叫《太平总类》。因为当时下令编书的皇帝宋太宗认为这部书“包括群书,指掌千古”,所以下决心要读这部书。为读完这部1000卷的大书,宋太宗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每天读3卷。此即“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sup>〔1〕</sup>。正是因为皇帝要读这部书,所以特别诏令改名为《太平御览》。那么,1000卷的书需要用多长时间读完呢?需要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一部书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读完,它的篇幅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而宋代以后编纂的书,篇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明代永乐年间所编的《永乐大典》,就有22937卷,抄成11095册。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也编有一部大书,叫作《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是10000卷,仅次于《永

〔1〕 王应麟:《玉海》卷五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乐大典》。这些图书,本来都是中国古代典籍当中的佼佼者,可以称之为“龙头老大”,可是它们跟《四库全书》一比,全都成了“小弟弟”。那么,《四库全书》的篇幅和卷帙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根据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数字统计,可以得知,这部《四库全书》有 79 337 卷,抄成 36 277 册,装成 6 144 函。这样的篇幅和卷帙,可以说是非常浩大的。如果按照宋太宗的读书计划,每天读 3 卷,那么一个人要读完这部《四库全书》,总共需要 70 多年。所以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在清代,单单是它的存放,就需要建造一座专门的藏书楼。

说了它的篇幅和卷帙,我们再来看它的收罗全备。《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至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到今(这个“今”,指的是当时编书的乾隆年间),也就是从先秦到清代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主要文献典籍,并且,它还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可以说,它集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因此,《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这样的美誉。在 18 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 二、《四库全书》编纂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即“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非常骄傲,他觉得自己的武功很了不起,无人能比,因此他看不起儒生,也不把儒家的典籍放在眼里。当时,有一个叫陆贾的儒生,经常在他跟前说起《诗经》、《尚书》这些儒家的典籍。刘邦当然听不进去,而且十分反感,他斥责陆贾说:天下是我骑马征战、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下来的,根本用不着《诗经》、《尚书》这些东西!陆贾毫不示弱,回敬了一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意思就是说:驰骋马上能够打天下,可是驰骋马上能够治理天下吗?刘邦听了以后,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于是,他就叫陆贾著书立说,帮他认真探讨秦朝失天下、汉朝得天下的原因。陆贾回去之后,果然发奋著书,前后写成十二篇。每写

成一篇，他都上奏给皇帝。汉高祖看了以后，连连说好，左右也都非常高兴，山呼万岁。于是便把陆贾这部书定名为《新语》。

这个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夺取天下，建立新的王朝，要依靠武力，但是治理天下，绝不能够仅仅依靠武力，而必须讲求文治。这就是“以武开基，右文致治”的道理，文治武功也因此而成为衡量历代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比较起来，文治的地位要在武功之上，作用也远比武功更为重要。综观历史，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手段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历代王朝几乎都有访书编书的举措，特别是在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样的情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汉代，几乎历朝皇帝都曾经下诏访求图书，到汉代末年，皇帝还特别下令整理图书，并编纂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唐代编纂了儒家经书的官方定本，当时叫《五经正义》，也称为《五经义疏》。除此之外，官府还组织编纂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宋代有著名的三大类书，就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还有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明代有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清代有康熙、雍正年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不仅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而且还形成了中国古代盛世修书的文化传统。

清代乾隆年间，可以说正是清代的盛世，也就是过去史学家经常称道的康乾盛世，其主要标志就是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用过去文人学者的评价来说，就是文治武功达到了极盛。我们知道，在武功方面，乾隆帝有“十全武功”，并且还自称为“十全老人”。而在文治方面，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四库全书》的编纂。

乾隆帝即位之后，为了讲求文治，曾经仿效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多次下诏访求图书。第一次是在乾隆六年（1741），第二次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第三次，则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但由于征访图书不像漕运、盐政、治河那样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各地督抚都不把它当回事，他们认为这不过是皇帝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所以乾隆皇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征书都没有什么成效。第三次，也就是乾隆三十七年的这一次，情况看来也不妙。尽管乾隆帝本人对征访书籍的事情极为重视，在谕旨中明确规定



了访书的标准和采集的范围,比如“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的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的书,以及“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等等,都在搜访的范围之内;甚至还专门制定了采书的方法,即“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1〕。但仍未得到各地督抚的重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征书谕旨是在正月发下去的,足足过了十个月,还没有一个地方督抚向朝廷呈送书籍。只有一个贵州巡抚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本省“地居山僻,书籍罕临,明经之士,于时艺诗章之外,鲜有撰述,可邀圣明采择”〔2〕。仅有的这份姗姗来迟的奏报,说的还是贵州这个地方太偏僻,书籍流通很少,当地的读书人水平也不高,除了八股文之外就没什么著述,因此无书可采,特此向皇帝报告,作一个说明。照此下去,也许这第三次征书也会跟前两次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事情忽然出现了转机,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当时,一位担任安徽学政地方官职的学者,他的名字叫朱筠,这位学者对图书典籍非常感兴趣,他响应乾隆帝征书的号召,专门就征书的问题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四条建议。其中第二条说,皇帝下诏征访图书,不光要搜集全国范围内的图书,清宫内廷所藏的图书也应该进行清理,进行采择。朱筠特别提到,清宫翰林院内就藏有一部大书,这部大书就是《永乐大典》。在这部《永乐大典》当中,收有不少当时社会上已经不流传的珍本和善本。他请求皇帝派专人进行辑录。

朱筠这份奏折奏上朝廷之后,在朝廷大臣当中可以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军机大臣就这份奏折提出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者认为,朱筠的这份奏折非常重要,征书、访书事关文治,意义重大,应当马上去做。反对者认为,征书、访书跟国计民生没有直接

〔1〕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排印本。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三日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关系,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去做。争论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在乾隆帝的默许之下,赞成的意见占了上风。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朱筠的奏折恰恰顺应了统治者讲求文治的需要,并且跟乾隆帝的征书谕旨刚好相吻合。于是军机大臣议定,选派翰林院官员去检查这部《永乐大典》,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知道,《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下令纂修的一部大类书。当年编纂的时候,永乐皇帝为标榜“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sup>〔1〕</sup>,特别命令儒臣广搜博采,“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sup>〔2〕</sup>。也就是说,要把上自先秦、下至明代所有的图书全都网罗进来,不要嫌多,多多益善。因此,《永乐大典》采辑的图书达七八千种之多,其中有不少是元代以前的珍本秘籍,而这些珍本秘籍有很多就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所以,当翰林官员奉命去查核这部《永乐大典》的时候,随手一翻,就发现了不少当时社会上已经亡佚不传的珍本秘籍。乾隆帝得知以后极为重视,立即下令派专人从《永乐大典》当中辑录这些失传的图书,并且决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切实开展征访图书的活动,同时采购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清理采择清宫内廷所藏的各种书籍,进而把所有的图书典籍都汇集起来,统一进行编排,定名为《四库全书》。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所以,后来人们追溯本原,把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的这道谕旨看作是编纂《四库全书》的先声,把朱筠看作是促成《四库全书》编纂的功臣,确实是有道理的。

### 三、《四库全书》编纂的情形和经过

乾隆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之后,朝廷沿袭开馆修书的惯例,很快就设置了专门的修书机构,称为四库全书处,也称为四库全书馆。皇帝直接

〔1〕 朱棣:《御制永乐大典序》,收入新影印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

〔2〕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二一,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



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还有六部尚书、侍郎,由这些宗室重臣和朝廷高官来担任四库全书馆的总裁、副总裁,如乾隆帝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瑤、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还有乾隆帝宠幸的朝廷大臣,当时担任领侍卫大臣、内务府总管、步军统领等诸多重要职务的和珅,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正总裁。还特别从翰林院以及全国各地征召著名的学者到四库全书馆来担任纂修官。据统计,先后参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朝廷官员和各地的著名学者就有 360 人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有我们大家熟知的纪昀,也就是纪晓岚,还有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姚鼐、金榜、王念孙等人,当然还有此前给皇帝上奏折的朱筠。

概括而言,《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从《永乐大典》当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这可以说是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当时,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有幸得以基本保存下来的这部《永乐大典》,收藏在翰林院典籍库中,长年蛛网尘封,无人看管。经过翰林官员仔细核查清点,统计出尚存 20 473 卷,9 881 册,另有目录 60 卷。根据这部大书卷帙浩瀚、内容丰富、头绪纷繁的特点,四库馆总裁专门制定了办理章程,即统一采辑标准、按册分派任务、规定工作进度、考核工作质量。具体说来,就是由总裁把各册《永乐大典》分派到各个纂修官名下,规定每天应当完成的工作量和考核办法。纂修官领到任务之后,便逐一认真检阅,一旦发现有符合标准、可供采择的珍贵典籍条目,就分别贴上标签,送到专门负责抄写的缮书处迅速抄写底本。底本抄成之后,又对照原书,详加校阅,改正讹误之处。然后根据各条目所记载的内容,反复考辨,多方比勘,尽可能把这些散在各处的篇章条目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排比编次,荟萃为一部完整的书籍,恢复它本来的面貌。经过众多纂修官多年的辛勤努力,总计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各类珍本、善本书籍达 385 种,其中经部 66 种、史部 41 种、子部 103 种、集部 175 种。可以说,这些珍贵典籍的失而复得、亡而复传,大大增加了《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并且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

第二,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书籍以及清宫内廷所收藏的书籍进行校阅,并且奉皇帝的命令新修不少书籍,把它们增入《四库全书》。清



宫内廷各处,如武英殿、懋勤殿、摘藻堂、味腴书屋等地,都藏有不少前代流传下来的旧书,还有本朝皇帝敕令纂修的书籍。四库馆开设之后,遵照乾隆帝的谕令,这些内府藏书也都被集中到翰林院,由总裁指定纂修官专职办理。由于这些书籍大多是官修、官刻本,有的还是皇帝“御撰”、“御制”之作,如乾隆初年校勘重刻的十三经、二十一史,康熙帝的《御制诗集》、《御制文集》等,因此一般直接送交缮书处抄写。只有少数发现有字句讹误,或者内容需要修改增补的书籍,才由纂修官分别加以校阅修改、补充完善。在办理这些内府藏书的同时,乾隆帝还不断下令临时增纂一些书籍收入《四库全书》,如《皇清开国方略》、《古今储贰金鉴》、《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等,所以四库馆内一些纂修官的工作重点也相应转入各种书籍的纂修,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编纂工作才基本办理完毕。

第三,对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书籍进行甄别取舍、考证校阅、分类编排。这可以说是四库馆内数量最大、任务最重、花费时间最多、程序也最为繁杂的工作。当时乾隆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之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各地督抚在乾隆帝的三令五申之下,采取各种方式搜访图书典籍。有的设立书局,聘请专人负责办理;有的利用书商贾客,往来各地访书买书;有的找来书目资料,按图索骥,查访书籍;还有的大力鼓励藏书家献书,把家藏珍本、善本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乾隆帝也采取种种措施,奖励那些为征书活动尽心尽力并且作出贡献的地方督抚和藏书家。因此,征书活动大见成效,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各地搜访进呈的图书,总数就达到 13 500 多种。这当中既包括各省督抚搜访进呈的书籍,也包括许多私人藏书家向朝廷呈献的书籍。所有这些图书都被集中到四库馆,供四库馆臣进行采择编选、考证校勘。要从数量如此浩繁的书籍中挑选质量好、价值高,既有学术水平又实用的图书,把它们收录进《四库全书》,工作起来可以说是极为繁杂、极为花费时间的。首先要进行全面的清理、甄别,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的书籍挑选出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版本的鉴定、真伪的考辨,再进而作内容的考证、文字的校勘。特别是对每一部书内容和文字上的考证和校勘,是非常需要学识和功力的。因为古书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讹误,有的是有意的删改,有的是抄写刊刻时发生的错误。要发现这些错误、用确凿的证据来证



明这些错误、靠深厚的学识来纠正这些错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据当时在四库馆内担任“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的翁方纲记载，在校阅书籍的过程中，凡有需要考证之处，纂修官之间都要反复商量讨论，并且开列需要查阅的书目清单，专门到琉璃厂各书肆查阅。当时江浙一带的书商知道朝廷开馆修书需要大量书籍，也都到处访求购买图书典籍运至京城，甚至整车整车直接送到这些纂修官的寓所，供他们翻阅查考。而纂修官见到这些好书，有的直接买下，有的专门雇人抄写，有的则借留一段时间，以备不时之需。正是因为担任纂修官的各位学者在书籍的考证校阅方面花费了极大的精力，纠正了许多讹误之处，恢复了不少书籍的真实面貌，所以后来乾隆帝特别下令，把学者们对这些古书考证校勘的成果汇集起来，编成《四库全书考证》一书。

所有书籍的考证校勘工作做完之后，还要根据乾隆帝制定的取舍标准，把它们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应抄书籍，也称为著录书籍。一般说来，凡是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珍本、善本，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以及实用的书籍，或者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的图书，都列入应抄的范围。其中特别稀见的珍本秘籍还专门送交武英殿刊刻行世，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计收书 138 种（其中 4 种为刻本）。第二类是应存书籍，也称为存目书籍。大体说来，凡是不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或者在纂修官看来学术水平不高、价值不大，甚至有错误之处的图书，都列入应存的范围。这类图书当时并没有抄录下来，而只是保存了它们的书目提要。

前面曾经说到，《四库全书》是一部汇聚了数千种书籍的大丛书。这里所说的数千种书籍，指的就是当年编纂完成后被完整地抄录下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图书。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存目书籍。因此，说到《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实际上包括两大类：一类叫作著录书，一类叫作存目书。著录书籍的数量，根据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统计数字，有 3 503 种，79 337 卷；存目书籍的数量，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数字，有 6 793 种，93 551 卷。两者合计在一起，总共有 10 296 种，172 888 卷。所以说，《四库全书》确实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四库全书》收书的数量这么庞大,怎样把它们分门别类、排比编次,统括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呢?这就需要借助传统目录学的工具和手段,对每一部书籍进行提要编目、分类编排。这就是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的大型官修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这部《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四库全书》的目录和总纲,而且还是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总结集成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专门著作。它根据传统目录学的正统分类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所有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然后在部下分类,类下再分为子目,也叫作小目。总共分为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一个小目。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还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在每一部的卷首撰写总序,在每一类的卷首撰写小序,有的子目后面还附有按语,而且为每一种书籍撰写了详细的书目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典籍内容,考辨篇章文字,评论长短得失。通过分门别类、提要编目的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庞大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已经想到了,《四库全书》的得名,是不是跟它的分类法有关呢?回答是肯定的。《四库全书》的名称,与它所采取的四部分类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把所有的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别,这种分类法是在唐代正式形成的。在此之前,汉人把图书分为六大类,当时称之为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种分类法出现的标志就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整理图书、编纂目录时著成的《七略》,以及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根据《七略》所作的图书分类。这在目录学史上叫作六分法。此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发展变化,图书的六分法逐渐向四分法转变。开始并没有经、史、子、集这样的名称,只是采用甲、乙、丙、丁这样的代号,并且在排列顺序上,子部书籍还放在史部书籍之前的位置。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史书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由此,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逐渐定型,四部的名称也正式形成,其标志就是唐代官修史书中的《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隋志》记载典籍,第一次把图书分类正式定



名为经、史、子、集四部。而唐代的国家藏书机构集贤书院收藏文献典籍，即根据这样的四部分类，分别把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收藏在四座藏书库当中，当时有一个名称，叫作“四库书”。唐代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就成为中国传统目录学史上的正统分类体系，四库书的称呼也流传了下来。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既采用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收书的范围又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全备，所以，乾隆帝亲自将这部大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

#### 四、《四库全书》的装潢与贮藏

《四库全书》编纂基本完成之后，乾隆皇帝以盛世君主的气魄，先后下令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北方和南方的七座藏书阁中。说到《四库全书》的贮藏，还有这样一段趣事。

由于《四库全书》的卷帙非常庞大，每一部《四库全书》都需要一座专门的藏书楼，那么建造什么样的藏书楼来收藏这样的大书呢？乾隆帝想到了浙江宁波的天一阁。这座天一阁，最早建成在明代的嘉靖年间，是当时的兵部侍郎范钦的藏书阁。这座藏书阁在当地非常有名，也很有特色，并且历经明末清初的战火，一直保存了下来，到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在浙东屹立了二百多年，以至于它的名声传到了乾隆帝的耳朵里。那么，这座藏书楼究竟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知道，古代藏书最怕的是火灾、虫蛀，还有潮湿，而天一阁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比如说为了防火，天一阁的名称专门用了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此说与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周易》有关。《周易·系辞》记载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共十个数字。其中，“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所以，“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且，这十个数都是一阴一阳，一奇一偶，两两相配，这就是“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但阴阳奇偶之间，究竟如何相配呢？据汉唐时期学者的解释，天数与地数各两两相配而成金、木、水、火、土，其中“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这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由来。范氏为藏书楼取名“天一”，寄寓以水克火之意。除了它的名称之外，天一阁在构造和

设计方面,也确实独具匠心。它特别建成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楼房,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在典籍的收藏方面,也极为讲究。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大间的那间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设计建构和严格的保护措施,使得天一阁历经二百余年的沧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所以乾隆帝下令,仿照天一阁的规制,为《四库全书》修建专门的藏书楼。

首先建造的是北方的四座藏书楼。这四座藏书楼,一座是京城皇宫内的文渊阁,一座是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一座是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还有一座就是东北盛京(今天的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这四座阁,人们称之为北四阁。由于它们都位于宫廷禁地当中,只供皇帝一个人阅览,所以人们又把这四座楼阁叫内廷四阁。

乾隆帝最初只打算把《四库全书》抄写四部收藏在北方的四阁当中,后来考虑到江浙地区号称人文渊薮,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书院林立,读书人众多,特别是在征书活动中贡献巨大,征集的图书数量高达9400多种,位居全国之首,如果《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当地士子都不能读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乾隆帝后来再次下令增抄三部,送往江浙地区,并在当地专门建造三座藏书阁用于收藏。这就是江苏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还有浙江杭州的文澜阁,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南三阁。由于这三座楼阁都分布在江苏、浙江一带,所以人们又管它们叫江浙三阁。

七座藏书阁建好之后,乾隆帝亲自为它们取名。尤其是对北方的四座楼阁,乾隆帝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除宫中文渊阁沿袭明代的称呼之外,乾隆帝将其他三阁分别定名为文源、文津、文溯,并且还为每一座阁各撰写了一篇记文。综观北四阁之名,不仅都带有一个“文”字,而且都跟水有关系,可以说,其中的含义非同一般。在乾隆帝看来,文的作用十分重要,包罗也非常广大,它可以用来“经世”,即经世致用、经世济民;可以用来“载道”,即承载、弘扬道德;可以用来“牖民”,即开启民智。也就是说,文



包罗了所有的知识和学问,也囊括了所有的道德和文章,所以四个阁的名称都有一个“文”字。那么为什么又跟水有关系,都带一个水字旁的字呢?原来,乾隆帝用文来喻水,认为经如同文之源泉,史相当于文之流脉,子就像文之分支,而集则是文之派别。经、史、子、集就像水的渊源和支脉一样,经是本源、是源泉,而史和子乃至集,都是由本源、渊源流衍出来的,都是经的分支和流派。也就是说,乾隆帝把浩瀚的文献典籍比喻成滔滔的江河之水,水由源流出,汇合百川而成为渊;如果要寻找源头,就要找到渡口,这个渡口就叫作津;找到渡口之后,由津溯流而上,又可以回到源。概括言之,四阁的命名,其意在于提醒人们时刻不忘古代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并且还要掌握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特别是东北盛京这座藏书阁,乾隆帝将其命名为文溯,还别有一番深意。众所周知,东北盛京是满族的发祥地,清朝统治政权可以说就是从这里起家的,所以,乾隆帝特意把东北盛京这座藏书楼命名为文溯阁,借此告诫后世子孙不要忘记祖宗创业之艰难,永葆清朝统治的江山社稷。

藏书阁的建造,可以说很好地解决了《四库全书》贮藏的问题。但在书籍的保存和利用方面,怎样才能做到既美观大方又方便查阅呢?这就要说到《四库全书》的装潢。《四库全书》的装潢是非常讲究、非常精美,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

在书册装潢形式上,《四库全书》采用的是包背装法。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册页书籍的装潢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蝴蝶装,就是将书页面对面折齐,在书页反面版心的地方抹上浆糊粘连,然后用较厚的纸作为书皮粘裹而成。用这种方法装潢的书籍,翻阅时版心粘在书背上不动,书页各向两边展开,很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叫作蝴蝶装,简称蝶装。二是包背装,即将书页正折,也就是反面相对折齐,使版心朝外,书页左右两边都向书背,用纸捻订起,然后用纸或丝绢将书册前后连同书脑,也就是书背,一并包裹粘连而成。由于这种装潢的方法不露书脑,所以称为包背装。三是线装,这种方法与包背装基本相同,但不用整张的纸或丝绢作书皮包背,而是在书的前面和后面各用一张同样的纸或丝绢作书皮,然后凿孔穿线装成。比较起来,蝶装的方式不损原书,但不经久,而且不便翻阅;线装结实耐用,但外观比较朴拙;包背装则介于两者之间,既比较结实,看上去又比